

年鉴学

NIAN JIAN XUE

肖东发等 著



方志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Local Records

年鉴学

NIAN JIAN XUE

肖东发等 著



方志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Local Record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年鉴学 / 肖东发等著.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 - 7 - 5144 - 1239 - 0

I. ①年… II. ①肖… III. ①年鉴—概论 IV. ①Z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9994 号

年 鉴 学

著 者: 肖东发等

责任编辑: 冯 松

出 版 者: 方志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9 号国家方志馆四层)

邮编 100021

网址: <http://www.fzph.org>

发 行: 方志出版社发行部

(010) 67110500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佳艺恒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28.25

字 数: 46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4000 册

ISBN 978 - 7 - 5144 - 1239 - 0/K · 999

定价: 52.00 元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回顾年鉴学的早期发展（代序）

“年鉴热”自1980年兴起至今已35个年头，中国年鉴研究中心即全国版协年鉴研究会也成立29个年头。回顾20世纪80年代年鉴事业及年鉴学研究的早期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

1974年，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后给朱天俊老师当助教，讲“中文工具书”课，还和中文系陈宏天老师一起编《文史工具书》教材，分配我负责“年鉴手册”一章。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年鉴的出版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当时只能讲1965年之前的几种年鉴。我曾向大公报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呼吁，尽快恢复编辑出版《人民手册》和《世界知识年鉴》，这篇文章发表在1977级学生办的刊物《初读》之上。

1980年，《中国百科年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其质量远远超过以往的年鉴和我原来的期望。我和陈慧杰高兴地在《世界图书》1981年第2期上发表了《喜读〈1980中国百科年鉴〉》，表达了我们欣喜的心情，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被《中国百科年鉴》引用印在1982年卷的腰封上。《中国出版年鉴》于1980年、《中国年鉴》于1981年、《世界知识年鉴》于1982年相继出版，大大丰富了我们的授课内容。我关注着新年鉴的创刊和出版动态，及时告诉北大图书馆负责工具书采购的朱宪。我记得他受我的感染，有的年鉴一下子就订购十本。这期间得以结识刚刚成立的中国出版发行科研所的方厚枢副所长，他正在主编《中国出版年鉴》。

在方厚枢老师的推荐下，我有幸出席了1985年9月在安徽省合肥市稻香湖宾馆举行的第二次年鉴编纂经验交流会，在这次会上正式成立全国年鉴研究中心，从那以后我与年鉴结下不解之缘。该中心后来改名为全国年鉴研究会，后来又归在一级学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之下，一直坚持开展学术活动，几乎每年都举办全国性、行业性、地区性年鉴编纂

经验交流会和研讨会，为我国年鉴事业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

2013年1月29日，时任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的王守亚先生特地从合肥赶到北京，出席中央和北京地区年鉴的团拜会。我们回忆起1985年的合肥会议。守亚说，他还找到28年前的一份会议通讯录。我请他给我发来，2月18日大年初九一上班，他就给我的邮箱传来通讯录照片，已是难得的资料。通过当年的章程草案及代表名单，使我回忆起大会盛况。不难看出，这次会议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来的代表很多，超过100人，正是当时改革开放大好形势和年鉴热的实际反映。代表们热情很高，大会发言、小组讨论十分热烈，会议的很多代表一直是年鉴研究的热心人。二是解决的问题很实际，我从保存至今的1985年第一期《年鉴通讯》可知，为开好安徽会议，1985年3月尚丁同志特意从上海赶到北京与在京的年鉴单位通气，召开了会前会，随后起草了年鉴研究会的章程，提出了候选人名单。会议完成议程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建立了年鉴研究中心，把全国年鉴界的同仁团结到了一起。三是上海去的领导同志和学者特别多，有20位，原因是在前一年1984年3月由《中国百科年鉴》编辑部等16个单位发起，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年鉴编纂经验交流会，为第二次合肥会议打下很好的基础。代表中有上海辞书学会会长汤季宏、副会长尚丁、副秘书长邓伟志、中国百科年鉴主编刘火子等，该中心是由《中国百科年鉴》编辑部、上海辞书学会和《辞书研究》杂志社倡议，经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支持，于1985年9月正式成立的。确定为一个探讨和交流年鉴理论与实践经验的联络中心，并报请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当时的局长徐力以派1983年由南京大学毕业、时任中宣部出版局期刊处副处长的邬书林（现任国家广电新闻出版总局副局长）前来参会。他于1984年在人大《资料工作通讯》上发表了《出好年鉴 用好年鉴》一文。近30年来，他一直十分关心年鉴事业。1992年至1997年，北大信息管理系举办过七届年鉴培训班，他多次出席开学典礼，做精彩的主题报告。四是会议还直接催生了我国年鉴学的建立，这一点很重要。原因是研究中心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和经验交流，设立基金，制定规划，年年组织召开会议。再就是有两个难得的研究阵地——《辞书研究》和《年鉴通讯》。

全国年鉴研究中心在年鉴学研究所发挥的积极促进作用特别值得充分肯定的。它本是一个民间的松散组织，在一无编制、二无经费情况

下完全靠会员单位自愿提供一些会费开展活动，中心秘书处的工作是由一些热心的同志纯义务支持的，自成立以来做了大量工作。

年鉴研究中心开展的这些工作成绩赢得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和年鉴界广大同仁的欢迎，1989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发文正式批准成立全国年鉴研究中心，同意其作为全国性文化组织继续存在。1991年初，“中心”又建立“年鉴研究中心基金”，制定有关使用办法，1990年7月“中心”建立了“年鉴学术工作领导小组”和“年鉴学术研究规划组”，并发了《关于加强年鉴学术研究工作的通知》，制定了《1990—1995年年鉴研究规划》，开始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年鉴学理论研究。为加强年鉴研究成果发表阵地的建设，“中心”于1991年又在北京创办了《年鉴工作与研究》这一寓学术性、知识性、实用性为一体的丛刊，年鉴学研究在后来迈出更大步伐。“中心”组织专家队伍对年鉴编校质量及年鉴研究成果进行多次评比，对质量优秀的年鉴和学术研究成果进行表彰，多次举办研讨会和经验交流会，举办培训班，注意基层队伍的培训。这些好的措施成为惯例，一直延续至今。

年鉴学的建立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后，我经常给各类年鉴界讲授有关工具书和年鉴的基本知识。我从1986年就提出建立年鉴学的学科体系。在《年鉴通讯》和《辞书研究》先后发表了《论年鉴学研究体系的建立》和《年鉴学刍议》等文章，立刻得到年鉴研究中心和各地年鉴界朋友的热烈反响。《年鉴通讯》的编者在发表我年鉴学大纲的按语中说：“改变了以往零敲碎打式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建立年鉴学这门新学科体系的总体设想，并提出了可供大家讨论的章目，这一探索无疑是可贵的。”

随即，武汉年鉴的几位同志找到我，表示愿意南北合作，发挥各自特长，共同完成了《年鉴学概论》。年鉴研究中心总干事长尚丁同志亲自给这本书撰写了序言，他在序言里写道：

“肖东发同志任教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潜心研究年鉴学理论多年，多次参加我们年鉴学的活动，被聘为全国年鉴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并在北大为研究生开出了‘年鉴学研究’课程，为中国年鉴事业的发展，浇过水、施过肥，培养了人才。现在，正当我们为提高年鉴质量，积极开展年鉴学理论研究的时候，又为我们送来了及时雨——《年鉴学概论》一书，不胜感谢。”

这部书1991年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首印4000册,第二年售罄。1993年第二次印刷,加印3000册。短短三年时间就发行了7000册。作者共五位,除我之外还有戴龙基、邵荣霞、钱锋和王建华。在这部书里,我们共分了历史、理论、事业、方法四篇13章。我主要撰写了绪论(年鉴学的学科体系)、理论篇中年鉴学基本理论和年鉴的性质与作用两章、事业篇中中国年鉴事业的发展一章;武汉年鉴社邵荣霞和钱锋同志撰写了事业篇中年鉴事业的管理与建设、方法篇中年鉴的编纂原理、表现形式和栏目以及年鉴的写作等五章;北大图书馆的戴龙基(当时在北大图书馆系讲“西文工具书”,后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撰写了国外年鉴史、外国年鉴事业及中外年鉴比较三章;王建华撰写了年鉴的类型一章并编写了两个附录:一是我国八十年代出版年鉴一览表;二是有关年鉴的论文资料索引(当时就已经收集到800余篇)。

在这部书的第七章里,我总结了年鉴事业的形成与发展、现存问题与解决思路、发展趋势,分析了港澳台地区编辑出版的年鉴。我认为,中国年鉴事业有如下特点:大都得到各级领导重视,品种数量发展迅猛,与改革同步,最能体现时代精神。在肯定我国年鉴内容严肃、发展健康等优点的同时,也存在内容质量不高、框架结构不稳、实用性与普及性不强、发行量不大、经济效益不佳等缺点,归纳出年鉴业正在向系列化、网络化、规范化、多样化、完善化及编辑经营性转化的趋势。

从1990年起,我在北大给图书馆学系研究生开出《年鉴学研究》课程,培养了一批以年鉴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仅90年代前期,我指导以年鉴学为题目的硕士论文就有90级硕士戴煜斌《论年鉴信息价值的生产与实现》、93级研究生周艳《论年鉴的实用性研究》、93级在职硕士李维《论年鉴编纂体例的规范化》、94级硕士生宋姣《方志与年鉴的关系研究》、《中国建筑业年鉴》编辑部的王秀兰《改革创新:推进年鉴的可持续发展》和96级硕士研究生李颖《中国早期年鉴编辑出版研究》等。

应该说,在年鉴学研究方面我国走在世界的前列。因为我们专门做过统计和调查,其他国家只有一些书中有关于年鉴的章节,没有整部书都论述年鉴的专著。法国年鉴学派在历史学领域影响巨大,但其研究对象不是作为工具书类型之一的年鉴,与我国的年鉴学内涵和外延并不一致。而我国仅在1990年前后就陆续出版了《年鉴学浅说》《年鉴编纂手册》《年鉴编纂百议》及《年鉴的功能与使用》等论著,这一良好的开

端，是与年鉴研究中心的组织与推动分不开的。

一晃《年鉴学概论》第二次印刷也过去20年了。在这20年间，由于该书已经售罄，找我求购此书的电话一直没断。每年都有不少新创刊的年鉴提出需求，一些出版多年的年鉴在培训新上岗的编辑时也多有呼吁。虽然我和邵容霞老师在2000年出版了《实用年鉴学》一书，但年鉴界同仁一直呼吁我修订再版“概论”。有不少同行明确表示更需要前一本书。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魏玉山副院长和庞沁文主编催促我增订此书，并表示中国书籍出版社愿意出版。2013年，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始组织编辑《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教程》，召开多次研讨会。2013年9月，在他们主办的北戴河培训班上，与方志出版社冀祥德社长、总编辑的交谈，促使我下决心在几个月的时间重新修订《年鉴学概论》一书。在这一过程中，衣彩天、徐艺婷、吴丽娜三位研究生做了大量工作。她们不但帮我更新数据，把20世纪80年代的旧例置换成新的案例，增加编撰现代化一章以及改革创新一章。把《实用年鉴学》中的合理部分吸收进来。国家图书馆的副研究馆员张丽丽早在三年前就与我建立联系，她担负的课题是编辑《建国以来中国年鉴总目提要》，在成立《年鉴总目提要》编委会时，聘请我做顾问。到2013年，她们编出了6000种年鉴的书目提要，还写出了《浅析新中国年鉴出版发行特点》一文，这篇文章能够反映60多年来我国年鉴的出版概况，包含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经本人同意，我把该文作为附录全文转载于本书之后。我还担任《北京大学年鉴》的学术顾问，经过近十年的打磨，该年鉴的框架结构及所包含的内容日臻成熟，对于行业或单位年鉴编纂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也把它列到附录之中。

在此对以上良师益友表示衷心感谢。应该说，修订仅是刚刚开始，我还要进一步征求意见，增补案例，加大数字化和国外年鉴的分量，把此书修订得更加完善。

肖东发

2014年1月20日于燕园

绪论 年鉴学的学科体系 / 1

历史篇 / 011

第一章 年鉴的史前史 / 013

第一节 年鉴的起源及雏形 / 013

第二节 古代的历法与历书 / 017

第二章 国外年鉴发展史 / 021

第一节 中世纪的历书 / 021

第二节 近代年鉴的发展 / 025

第三节 现代年鉴的完善 / 030

第三章 中国年鉴发展史 / 034

第一节 我国史书与年鉴之比较 / 034

第二节 地方志与年鉴之比较 / 041

第三节 现代年鉴在中国的早期发展 / 046

理论篇 / 055

第四章 年鉴的基本理论 / 057

第一节 年鉴的定义 / 057

第二节 年鉴的特点 / 068

第三节 年鉴与其他类型工具书的关系 / 070

第五章 年鉴的性质与作用 / 075

第一节 年鉴的性质 / 075

第二节 年鉴的基本职能 / 079

第三节 年鉴的价值与作用 / 084

第四节 年鉴实用性的探讨 / 098

第六章 年鉴的类型 / 102

第一节 划分年鉴类型的意义和标准 / 102

第二节 综合性年鉴 / 107

第三节 地方性年鉴 / 119

第四节 专科性年鉴 / 126

第五节 统计性年鉴 / 131

事业篇 / 137

第七章 中国年鉴事业的形成与发展 / 139

第一节 我国当代年鉴事业发展概述 / 139

第二节 我国年鉴事业的重要成就 / 144

第三节 我国年鉴事业现存问题及解决思路 / 150

第四节 我国年鉴事业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 158

第五节 台湾省及港澳地区出版的年鉴 / 163

第八章 国外年鉴事业的现状 / 168

第一节 世界年鉴出版概况 / 168

第二节 国外重要年鉴介绍 / 178

第三节 国外地方年鉴举要 / 183

第四节 国外年鉴发展趋势 / 185

第九章 中外年鉴的比较研究 / 191

第一节 比较年鉴学的提出 / 191

第二节 西方年鉴的类型及特点比较 / 193

第三节 中外年鉴事业的宏观比较 / 201

第四节 中外年鉴事业的微观比较 / 206

第五节 年鉴实用性比较 / 212

第六节 中外年鉴实用性差异产生的原因 / 224

第十章 年鉴事业的管理与建设 / 230

第一节 年鉴的管理 / 230

第二节 年鉴的经营 / 235

第三节 年鉴的基本建设 / 238

- 第四节 年鉴与公关工作 / 252
- 第五节 年鉴的用户研究 / 257
- 第六节 年鉴事业的多方位开发 / 269

方法篇 / 273

第十一章 年鉴的编纂原理 / 275

- 第一节 年鉴编纂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 275
- 第二节 年鉴的总体设计与框架结构 / 280

第十二章 年鉴的栏目 / 297

- 第一节 文章 / 297
- 第二节 概况 / 301
- 第三节 纪事 / 304
- 第四节 特载 / 308
- 第五节 条目 / 310

第十三章 年鉴中的资料 / 319

- 第一节 文献和法规 / 319
- 第二节 统计资料 / 321
- 第三节 调查报告 / 327
- 第四节 图表 / 330
- 第五节 二次文献 / 336

第十四章 年鉴中的其他内容 / 345

- 第一节 人物 / 345
- 第二节 名录 / 350
- 第三节 广告 / 353
- 第四节 附录 / 357
- 第五节 检索系统 / 362

第十五章 年鉴的写作 / 369

- 第一节 搜集、整理资料 / 369
- 第二节 优化选题, 精心设目 / 371
- 第三节 熟悉文体文风 / 373
- 第四节 掌握条目写作方法 / 377

第五节 遵守书写规范 / 380

第十六章 信息时代的年鉴 / 382

第一节 年鉴电子化、网络化 / 382

第二节 编辑现代化 / 392

第三节 年鉴全文数据库 / 400

第十七章 年鉴的改革创新 / 404

第一节 编辑观念要更新 / 404

第二节 编纂内容要调整 / 406

第三节 编纂形式要多样化 / 411

第四节 编纂技术要现代化 / 415

附录1 浅析新中国年鉴出版发行特点 / 416

附录2 北京大学年鉴框架及主要内容 / 434

主要参考文献 / 440

绪论 年鉴学的学科体系

年鉴学的学科体系,是年鉴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特别是在开始建立这门学科的时候,有必要对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对象、任务,研究意义、研究内容和体系结构,年鉴学与相关学科的联系,以及年鉴学的研究方法等问题首先进行讨论。

一 年鉴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任务

1. 年鉴学的研究对象

年鉴学,这一学科的名称是书籍的一种类型——年鉴。年鉴学要研究年鉴,这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样表述还不够完全。应该说,年鉴学是以年鉴和年鉴事业为对象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学问。

这个表述包括如下几层含义:

(1) 年鉴学要研究年鉴,但不只是孤立地去研究单个的年鉴,它还要研究由众多年鉴组成的群体,即年鉴事业。所谓年鉴事业,是指人们有目的、有意识、有组织地编纂、出版、使用、评价和发展各种类型年鉴的全部过程,以及围绕着这些过程所进行的一切活动的总和。而且,这种研究并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要从社会、心理、经济、科学诸方面去研究年鉴与社会、年鉴与读者、年鉴与信息交流、年鉴与改革开放、年鉴与人类发展的关系,从而明确年鉴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机制。

(2) 年鉴学不是静止地去研究年鉴事业,而是将其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这种研究不但包括现实阶段上的年鉴事业,也包括历史上的年鉴事业。一部完整的年鉴学,应该包括年鉴发展史,而且要从它的史前史起,研究它的起源和最初形态。

只要认真分析一下今天的年鉴的形式和构成,就会发现年鉴与古代的历书、史书及地方志联系非常密切。只有尊重历史事实,进而认清促

成年鉴的产生和影响年鉴的诸多因素和过程,才能总结历史经验和规律,有利于研究年鉴事业的今天,开创年鉴事业的未来。

(3) 年鉴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以整个年鉴事业为对象,是为宏观的研究,它包括年鉴的数量发展、规模速度、总体布局、宣传评价、组织管理、社会作用、发展规律等问题;以各个不同类型年鉴为对象,是为中观的研究,如综合性年鉴、地方性年鉴、专科性年鉴及统计性年鉴等,各有其特点、任务、组织形式、管理体制和发展规律,都需要分类总结研究;以具体一种年鉴为对象,是为微观的研究,包括年鉴的结构与体例设计,年鉴内容的选择与编排,条目的撰写,索引的编制等。

2. 年鉴学的任务

(1) 通过对年鉴及年鉴事业的性质、特点、作用等方面理论的探讨,加深对年鉴及年鉴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近年来,我国年鉴事业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有关年鉴的文章也有空前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30多年来,有关年鉴的文章发表了6000余篇,而在30年前,这类文章却极为罕见。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6000多篇文章中,有关基础理论方面的文章并不多,学科研究是很不够的,理论是指导学科发展的,其深度如何,标志着学科水平,决定学科的地位。弄清年鉴的定义、性质、作用等基本理论,可为年鉴事业的健康发展开辟道路。

(2) 通过对年鉴编纂活动中的具体方法和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加强对年鉴编纂业务以及年鉴事业的组织与指导。30多年来,我国年鉴编纂工作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上溯几十年以至几百年,人类编纂使用年鉴的经验则更为丰富,然而总结和概括工作却十分不够。一方面要概括各类年鉴共同的编纂规律和原则,另一方面要根据共同的编纂规律和原则的要求,研究各类年鉴以至具体年鉴特殊的编纂方法和技术(包括年鉴的总体设计,编纂体例,不同类型年鉴的框架结构,各种栏目及主要表现形式),研究年鉴工作的组织管理,使年鉴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3) 通过对读者需求及年鉴用法的研究,进一步提高年鉴的功效。这也是当前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到2013年底,我国已出版6000余种年鉴,对中国人民增加文化科学知识,进一步探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应该起到重要作用。然而事实上,年鉴作用远未充分发挥,这是因为对年鉴的宣传、利用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年鉴学的基本任务之一是要

分析读者对象及其需求,对古今中外各类年鉴加以评价、介绍。通过对现有年鉴的分析,实事求是地揭示其优缺点,不但使有关年鉴的编者有所借鉴,同时也对广大读者鉴别、选择、利用年鉴提供帮助。

二 年鉴学的特点

与其他学科相比,年鉴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年鉴学是一门年轻的、正在发展中的科学。作为一种及时传递信息的编年体的工具书,年鉴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早在人类文明初创阶段,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代中国都出现了原始形态的年鉴。在其后的几千年里,随着人类的进步,年鉴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功能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趋完善。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年鉴,也已走过了五六百年的历程。然而,以年鉴和年鉴事业为研究对象的年鉴学,却始终没有出现。查阅国外各种图书目录,至今没有发现一部关于年鉴的专著,只是在有关辞书、工具书的期刊教材中,散见有关年鉴的章节及个别文章。使用“年鉴学”这一词汇,呼吁建立年鉴学这一独立学科,是我国国内出现的新动向;几部有关年鉴学的论著正陆续问世,可以说,在这一学科的研究上我国已走在世界前列。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年鉴的编纂出版实践与理论研究交相辉映,进展空前,大体经历了对年鉴的介绍、使用及评价,年鉴编纂经验的总结及方法的交流和年鉴理论上的研究探讨三个阶段。与其他古老的学科相比,年鉴学实在是太年轻了,算不上一门完整的、成熟的学科,说得苛刻一点,似乎还处在一个前科学的阶段。有许多难点有待突破,许多值得争鸣的课题有待探讨。它是研究者们大有作为的天地,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二,年鉴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科学。年鉴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与年鉴有关事物的科学。年鉴是出版物的一种类型,它本身有其特定的编纂出版实践。年鉴学的理论就是要为年鉴编纂出版实践服务。一方面它是年鉴编纂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另一方面它又要指导年鉴编纂工作实践,并受其检验。因此,年鉴学的理论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特指性,它始终与年鉴的编纂工作紧密相连,在整个年鉴学的体系结构中,年鉴编纂工艺学占有较大的比重。

第三,年鉴学是一门开放型学科。年鉴可划分为各种类型,既有综

合性的，又有专科性的，各个学科、各个知识门类在年鉴中几乎都应有所反映。年鉴几乎可为社会上各学科、各专业的文化人服务。因此，年鉴学有必要也有可能吸收并应用各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年鉴学是一种动态的开放型的学科，绝不能自己封闭在窄小的圈子里，它要向编辑们开放，向撰稿人开放，还要向各条战线、各个行业的读者开放。它要吸收国内外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国外年鉴编纂的经验。年鉴本身的特点也决定了它比任何出版物都更为关注新学科的产生和学术新成果的涌现。这种对其他学科的包容性和对新学科、新事物、新方法的敏感性，不仅表现在年鉴内容上，也应体现在年鉴学的研究之中，只有如此，才能使这一学科加速走向成熟和繁荣。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个学科如此年轻，所以这部书也不可能是完备、成熟之作。我们只是力图在全书贯穿这样四个基本思想：一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二是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三是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四是广泛吸收当前本学科最新成果，探索开拓，为广大年鉴的编纂者和读者提供一本及时的参考书，也为有志于此的研究者搭起前进的阶梯或铺上一块砖石。

三 年鉴学的研究意义

为什么要开展年鉴学的研究呢？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一切理论研究的诱因和动力，往往产生于实践活动之中，而理论研究的成果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建立年鉴学绝非偶然的心血来潮，而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年鉴事业的需要，是年鉴编纂队伍建设的需要，也是实际工作的需要。

1. 从年鉴理论研究发展看，我国对年鉴理论的研究时间较短，实践中提出的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我国当代年鉴理论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13年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起步；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年鉴学的建立；90年代中后期至今——稳定发展。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我国年鉴事业在取得新发展的同时，也遇到许多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很少遇到或并不显著的新问题、新情况，研究、解决这些新问题、新情况，将是今后年鉴事业能否正常发展的关键。首先，年鉴作为社会主义的精神产品生产，必须解决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的根本目的和市场经济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标

两者之间的矛盾。因此,年鉴界既要探讨哪些市场经济运行规律适合于年鉴编纂与经营,也要分析年鉴作为精神产品,具有哪些不同于一般物质生产的特殊属性,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取得尽可能好的经济效益。同时,要迅速把研究成果贯彻到年鉴实际工作中去,这是政策研究、学术探讨和年鉴工作者必须回答的问题。其次,把年鉴作为信息产业对待,是走向生产经营型所需要的思路。目前年鉴信息仅仅一次利用(以年鉴出版)实在太可惜,应该全面、系统研究信息产业的生 产规律,并引入年鉴生产,具体地说,应该及早着手进行年鉴信息资料的二次开发,把年鉴作为再生资源多次利用,使年鉴业真正成为高层次的信息产业。此外,探讨年鉴多种经营的理论依据,探讨信息公司、咨询公司、股份公司等的可行性,也是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2. 从年鉴编纂队伍建设来看,目前的状况是相当数量的年鉴编辑人员匆忙上阵,有的原来是搞统计工作的,有的是编地方志的,有的是新闻记者,还有的是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他们各有专长,然而对年鉴的性质、特点、作用、类型、结构、框架、层次、编排体例、检索途径等一系列问题,还不大熟悉和了解。他们大胆实践,边干边学,赶出了一批“急就章”,对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一定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但长此下去,难以为继。实际上他们一直在提高自身素质和年鉴质量两方面下功夫。全国年鉴研究中心自1985年成立以来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把举办年鉴编纂人员培训班列为重点工作之一。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训练年鉴编辑人员是十分必要的,而写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较为系统的年鉴学教材,则是加强队伍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

3. 从实际工作角度来看,也有大量问题需要有较为一致的答案。仅就选材而言,要不要收非年度资料?一些变化不大的基本情况要不要重复反映?收不收调查报告等一次文献?要不要预测性内容?统计数字由于来源不同不一致怎么办?要不要收人物志?收录标准怎么定?要不要刊登广告?要不要编索引?……有些问题带有普遍性,与年鉴的性质特点等基本理论问题有直接的关系。正是由于对这些基本问题还存在着某些糊涂认识,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争论不休,似乎难以解决。为什么那么多的年鉴没有索引?怕费时间,怕占篇幅,怕提高成本,说来说去还是对年鉴的工具书性质应具备方便读者查阅这一根本特点认识不清。各类专科年鉴、地方性年鉴应该编出自己的特点,突出自己的个性,但